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1), 132-13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6.1511471

Hans汉斯

从“经济脱贫”到“精神丰盈”：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的使命担当转化逻辑

邓美宝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惠州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正经历由物质兜底向精神赋能、价值铸魂的范式迭代。当前资助工作普遍止步于经济脱贫的基础功能，在精神培育、价值塑造与使命引领层面存在短板，物质帮扶向精神丰盈、个人成长向使命担当的转化过程存在多重现实梗阻。立足资助育人范式演进脉络与核心价值指向，梳理资助育人赋能青年使命担当的内在生成机理，剖析从经济脱困到精神进阶的转化困境与深层成因，构建适配高职院校育人特色、贯通扶困、扶志、扶智的立体化育人路径，能够推动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深度转型，助力家庭经济困难高职学生实现精神丰盈与职业使命觉醒，为新时代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培育技能报国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

关键词

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发展型资助，使命担当

From “Economic Poverty Alleviation” to “Spiritual Enrichment”: The Transformative Logic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ibao De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City College of Huizhou, Hui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30,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文章引用: 邓美宝. 从“经济脱贫”到“精神丰盈”: 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的使命担当转化逻辑[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1): 132-138. DOI: 10.12677/ve.2026.1511471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material subsistence to spiritual empowerment and value cultivation. Current aid work generally stops at the basic function of economic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shortcomings in spiritual cultivation, value shaping, and mission guidance. Multiple practical obstacles exi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terial assistance to spiritual enrichment and from personal growth to mission commitment. Grounded in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nd cor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rinsic generativ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empowers youth mission commitment,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s and underlying causes in the progression from economic relief to spiritual advancement,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al pathway that accommodat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tegrates poverty relief, aspiration cultivation,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is approach can driv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from subsistence-oriented aid to development-oriented aid, help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chieve spiritual enrichment and vocational mission awakening, and provide practical suppor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to fulfill their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skilled talents dedicated to serving the nation through technical expertise.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Oriented Financial Aid,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时代职业教育正在进入提质培优、内涵发展的新阶段，资助育人作为高职院校立德树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定位与价值范式已然发生深刻变革。传统资助育人以经济帮扶为核心，有效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困境，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底线保障。但单一的物质帮扶模式已难以适配现代职业教育育人要求，育人重心亟需从解决生存困境的经济脱贫转向实现全面发展的精神丰盈，最终落脚于新时代青年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担当培育。

从育人实践现状来看，当前高职资助体系存在范式滞后、转化不畅、价值弱化等突出问题。经济帮扶常态化、精准化的同时，精神滋养缺位、价值引领碎片化、使命培育虚化等问题普遍存在，形成“经济脱困易、精神成长难、使命塑造弱”的育人断层。有研究指出，高职资助育人工作面临“三重使命与三重困境”的结构性矛盾[1]。

基于育人工作的现实短板与时代诉求，本文尝试遵循“溯本明向－检视归因－析理证成－破局建构”的完整逻辑脉络，对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促进使命担当生成的转化逻辑进行阐释，以期推动高职资助育人真正实现从“扶困”到“扶志扶智”、从物质保障到精神铸魂的高质量转型。

2. 溯本与明向：资助育人的范式演进与价值指向

从育人范式变迁来看，高职资助育人先后经历保障型资助、发展型资助两个核心阶段，不同阶段对

应不同的价值目标。

(1) 保障型资助：以“经济脱贫”为目标的传统范式。我国高职院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基本形成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格局[2]。从制度演进的脉络来看，高职资助政策经历了从“单一奖助”到“多元保障”、从“零星覆盖”到“应助尽助”的发展历程[3]。传统资助模式以“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首要目标，通过“奖、助、贷、勤、免、补”六位一体手段实现经济兜底。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输血式”帮扶——以经济资源的单向输送为基本手段，以满足受助学生基本生存需求为直接目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应当承认，这一范式在保障高职学生受教育权利、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生源中农村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占比较高的背景下，保障型资助有效阻断了因贫失学的风险，维护了教育起点的基本公平。

然而，保障型资助的局限性同样不容忽视。当资助工作被简化为“发钱发物”的技术性操作时，资助便退化为一种单向度的经济转移支付，其育人功能被严重弱化。实践中，部分高职院校将“精准认定”视为资助工作的全部，“表格育人”“材料评审”等现象普遍存在，资助过程中蕴含的价值引导、精神激励、责任培育等功能长期处于“沉睡”状态。有研究指出，资助育人面临资助对象认定不精准、资助内容不协调、资助中未能突出“育人”理念等问题[4]。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保障逻辑对发展空间的系统性挤压。

(2) 发展型资助：政策话语中的范式转向。进入新时代，资助政策的顶层设计发生了显著转向。2017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1]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四位一体”发展型资助体系，强调物质帮扶与精神激励并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进一步要求“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将资助工作纳入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框架。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3]提出从“应助尽助”向“优助精助”转型，标志着资助政策的重心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在政策话语转变的同时，学界对发展型资助的内涵也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理论探讨。综合既有研究，发展型资助可界定为以“经济帮扶 + 能力提升 + 价值引领”为三维联动机制、以促进受助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资助育人模式。有学者将发展型资助定义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困难学生发展与成长的一种资助模式，其理论基础可置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5]。

值得关注的是，产教融合为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提供了独特路径。研究表明，产教融合能够整合岗位资源、导师力量及各类培训资源，推动资助工作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6]。以“精准资助”理念为指导的“三多三精准”模式(多维度认定渠道、多举措保障机制、多元化帮扶体系)也为高职资助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参照[7]。

(3) 精神丰盈：使命担当作为发展型资助的价值内核。随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扶困扶志扶智协同育人政策导向不断强化，资助育人逐步迈向发展型资助范式，育人重心由单纯物质救济转向学生全面发展，“精神丰盈”成为重要价值追求。所谓精神丰盈，是指受助学生在摆脱经济压力之后，实现人格自立、心理自信、意志自强，具备健全自我认知、抗挫折能力、感恩意识与职业认同感，摆脱“等靠要”被动心态，形成内生成长动力。它意味着受助学生不仅“站起来了”(经济上脱困)，而且“强起来了”(精神上富足)；不仅实现了“生存”，而且追求着“意义”。

[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s7060/201712/t20171206_320698.html
[2]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3]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6/content_6886110.htm

“精神丰盈”并非一个空洞的情感化表述，它有着“使命担当”这一具体而坚实的价值内涵。高职资助育人肩负着既要实现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的多重使命[8]。这三重使命的落脚点，正在于培养受助学生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对技能报国的信念、对回馈社会的自觉的使命担当。换言之，使命担当是“精神丰盈”在价值层面的集中表达，也是发展型资助区别于保障型资助的核心价值标识。

3. 检视与归因：从“经济脱贫”到“精神丰盈”的转化困境

(1) 目标偏离：保障逻辑对发展空间的挤压。部分院校与一线资助工作人员依旧延续保障型资助思维，把资助工作等同于资金发放，认为完成困难认定、落实补助政策即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对“资助即育人”的理解浮于表面。在绩效考核导向下，资助工作更多考察资助覆盖率、资金到位率等可量化指标，学生精神成长、人格变化等软性育人目标难以纳入考核，造成重事务落实、轻精神滋养的工作倾向。部分教育工作者简单认为，只要解决经济困难，学生自然会实现精神成长，忽视家庭经济困境带来的自卑、自我否定、身份标签等心理遗留问题，看不到物质帮扶与精神成长之间存在的现实鸿沟，精神培育处于边缘化位置。

(2) 过程脱节：资助工作与育人实践的“两张皮”。资助育人应当嵌入学生教育全过程，但不少高职院校中，资助业务归口学生管理部门，精神教育、思政教育归属于思政教学、二级学院，部门之间缺少常态化协同，资助业务和课程教学、实践育人相互割裂，形成“两张皮”现象。这种组织层面的分割带来了两个层面的脱节。其一，是“资助过程”与“价值引导”的脱节。学生在填写资助申请、提交证明材料、接受资格审核的全流程中，感受的是一套标准化、程序化的行政操作，很少有机会在其中接触到价值观层面的引导。资助对他们而言是一次“办手续”而非“受教育”。其二，是“受助体验”与“使命教育”的脱节。学生在思政课堂中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等内容，往往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难以与自身真实的受助经历建立有意义的联结。当“国家资助”仅仅被理解为“一笔钱”而非“一种关怀”，当“受助”仅仅被体验为“获得帮助”而非“承接期待”，受助学生就难以从资助经历中自然生长出使命担当。

(3) 认知偏差：学生主体性在“受助”定位中被遮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除经济压力之外，往往伴随复杂心理体验。一部分学生存在“受助者标签”带来的心理羞耻感，回避资助相关活动，不愿主动表达自身心理困惑；另一部分学生将资助视作理所应当的政策福利，感恩意识淡薄，内生奋斗动力不足，形成“被动接受帮扶”的心理定式。高职生源中不少学生成长环境相对复杂，部分学生缺少生涯规划意识，对职业价值、青年责任缺少深刻认知。外部经济帮扶可以解除外部困境，但精神丰盈必须依靠学生主体自我建构，当学生自身缺少成长意愿时，外部育人举措很难真正落地，外在帮扶无法直接转化为内在精神品质。

(4) 价值缺位：使命教育在资助体系中的制度性失语。从经济脱贫走向精神丰盈是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需要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全周期的持续引导。现实当中，多数院校缺少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周期成长跟踪机制，资助认定多为年度静态审核，对学生心理变化、学业起伏、思想动态跟踪不足。有研究者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提出将人文关怀、教育目标优化和多元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纳入发展型资助框架，但其核心价值指向仍不够清晰[9]。现有育人举措多为零散点状活动，缺少分层递进的系统化设计，没有针对大一适应阶段、大二能力提升阶段、大三实习就业阶段设计差异化精神培育方案。同时，缺少适配资助育人的评价体系，评价侧重政策落实结果，缺少对学生人格状态、意志品质、责任意识的过程性评估，育人成效难以反馈迭代，制约从经济帮扶到精神成长的完整转化。

4. 析理与证成：资助育人促进使命担当的生成逻辑

(1) 理论支点：从“受助感知”到“担当自觉”的转化机制。具体而言，这一转化机制可以分解为三个递进的环节。第一环节是“受助感知”：受助学生通过资助申请、资格审核、资金发放等环节，直观地感受到国家制度和学校组织的关怀与支持。在这一阶段，关键在于让受助学生“看得见”资助背后的制度逻辑和人文温度，而非仅仅“摸得着”到账的金额。第二环节是“价值认同”：在感受到关怀的基础上，受助学生逐渐形成对社会制度的认同、对主流价值的认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信任。这一环节的关键在于帮助受助学生建立“个人受助”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意义关联，让他们理解“为什么是我受助”和“国家为何这样做”。第三环节是“担当自觉”：当价值认同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后，受助学生便可能萌发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的意愿和行动，进而形成使命担当。

(2) 实践空间：高职产教融合场域中使命培育的独特优势。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具有鲜明的类型特征。学生群体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较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预备者，其职业成长路径与“技能报国”“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高度耦合。这一群体特征为使命担当的培育提供了天然的实践载体。受助学生在校企合作平台上参与生产性实训、在企业真实岗位上进行顶岗实习、在技能竞赛中锤炼专业能力，这些场景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使命教育资源。当他们以“准职业人”的身份走进车间、走进工地、走进服务一线时，他们不仅是在学习技术技能，更是在亲身体验“劳动创造价值”的朴素真理，是在直观感受“技术技能人才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宏大叙事的具体呈现。

(3) 条件支撑：使命担当转化发生的现实前提。从“受助感知”到“担当自觉”的转化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的支撑。这些条件既是转化机制得以运转的保障，也是高职院校在资助育人实践中可以主动建构的变量。一是意义赋予条件，资助过程需在申请、审核、发放等节点传递可被感知的价值信号，而非退化为“填表–打款”的冰冷流水线；二是主体激活条件，受助学生需以能动者身份参与资助过程，从“被救助的对象”转变为“主动成长的参与者”；三是场域贯通条件，资助场域需与职业场域形成意义联结，使“技能报国”成为可感知、可实践的行动路径。这三重条件不是外在于转化过程的附加要求，而是转化得以发生的内在前提。高职院校推进资助育人从“经济脱贫”走向“精神丰盈”，实质上就是在这三个条件维度上持续投入和系统建设的过程。

5. 破局与建构：通向“精神丰盈”的育人路径

立足资助育人范式演进规律，针对从经济脱贫到精神丰盈转化过程中的现实梗阻，结合使命担当的内在生成逻辑，高职院校应当推动资助工作从保障型全面转向发展型资助，构建“兜底保障–精神赋能–实践淬炼–制度保障”协同的育人体系，打通“经济脱贫–精神丰盈–使命担当”完整育人生态。

(1) 理念重塑：确立使命导向的发展型资助价值观。破解转化困境，首先需要从理念层面正本清源。发展型资助不应停留在“经济援助 + 能力培育”的复合模式层面，而必须升级为“经济援助 + 能力培育 + 价值引领”的立体模式。资助工作不应仅仅被视为一项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而应被自觉纳入“三全育人”的总体格局和“大思政”的工作体系之中。具体而言，需在三个方面形成共识：明确使命担当培育是发展型资助的“规定动作”而非“自选动作”，受助学生是否获得精神成长和价值引领，是衡量资助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将“是否促进了学生使命担当”纳入资助工作评价的核心指标，打破以“覆盖率”“发放准确率”为主的单一考核体系；构建“制度弹性化、执行专业化、认同内生性”的协同机制，在制度设计、执行能力和效果认同三个层面同步推进。

(2) 机制嵌入：将使命教育融入资助全流程。理念的落地依赖机制的保障。在认定环节，应在家庭经济情况核查之外增加“成长需求评估”，资助申请表中设置“我的成长目标”“我对未来职业的期待”等发展性提问，引导受助学生从“我有多困难”转向“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资助过程中，应嵌入“受助

承诺”或“成长契约”环节，为受助学生提供将“受助体验”与“责任意识”建立联结的契机，并通过座谈、分享会等活动形成同伴教育效应。在后续追踪环节，应建立“受助、成长、反哺”电子档案，持续记录受助学生的学业表现、能力发展与价值观念变化，既是评估育人成效的数据基础，也是激励持续成长的重要载体。

(3) 载体创新：构建“解困、赋能、铸魂”三阶递进体系。使命担当的培育应构建层次清晰、逻辑连贯的递进式育人体系。第一阶“解困”是基础层，核心任务是精准识别、应助尽助，解除受助学生的经济后顾之忧。这一环节本身也蕴含育人契机，资助政策的公平性、程序的规范性、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在无声地传递价值信息。第二阶“赋能”是提升层，核心任务是通过分层分类的帮扶措施提升受助学生的学业能力和职业竞争力，借助产教融合平台和“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多元导师力量，让受助学生获得“我能行”的自我效能感，这是使命担当生成的重要心理前提。第三阶“铸魂”是升华层，核心任务是引导受助学生将受助体验转化为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通过主题教育活动、志愿服务队、劳模结对帮扶、技能报国社会实践等载体，让受助学生在“做”中“悟”。

(4) 生态优化：校企社协同的使命共育机制。高职院校的类型特征决定了其资助育人不能“关起门来办学”，而必须充分利用产教融合的办学优势。在企业力量参与方面，应引导合作企业设立“技能励志奖学金”或“企业公益助学基金”，并要求受助学生参与企业组织的公益项目或行业实践，在“用技能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切身体会“技能报国”的现实意义，形成“资助、实践、回馈”的闭环。在社会资源整合方面，可联合地方共青团组织、志愿者协会、社区服务中心等搭建公益服务平台，让受助学生在服务社会中深化对“担当”的理解。在校内力量协同方面，可将思政导师、专业导师、企业导师、朋辈导师等纳入资助育人共同体，定期沟通受助学生成长状况，协同制定个性化培育方案，避免“资助归资助、思政归思政、教学归教学”的条块分割局面。

6. 结语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资助育人正在经历深刻范式转型，工作目标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脱贫，迈向精神丰盈与使命担当培育的高阶育人目标。经济脱贫、精神丰盈、使命担当构成层层递进的价值链条，经济脱贫提供现实基础，精神丰盈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使命担当是资助育人的价值归宿。高职院校应当坚持扶困、扶志、扶智相统一，重塑发展型资助育人理念，优化资助资源供给，激活学生主体实践力量，完善全周期闭环育人机制，打通从经济解困到精神丰盈再到使命担当的完整链路，充分释放资助育人立德树人效能，为国家培育更多自立自强、技能报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基金项目

2026 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课题“艺术赋能 • 三链融合：资助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 + 资助’创新实践研究”(GDZZZWH20262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兰海涛, 屠明将, 余燕青.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J]. 教育与职业, 2021(11): 48-51.

[2] 李琼. 新中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121-130, 170-171.

[3] 杨忠. 资助育人视域下新时代我国高校资助政策的演进逻辑、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J]. 教育财会研究, 2025, 36(5): 87-94.

[4] 陆红霞, 丁玉梅. “五育并举”视域下探究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实践路径[J]. 就业与保障, 2024(10): 139-141.

[5] 侯美玲. 当代学生的弱势经济心理现象及教育干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9, 39(17): 15-17.

[6] 邵琪. 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J]. 教育教学研究前沿, 2026, 4(6): 171-173.

[7] 刘许亮, 柴杉. 基于“三多三精准”模式的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体系构建[J]. 教育与职业, 2020(15): 40-44.

[8] 顾雁飞. 基于“志智双育”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实践路径研究[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1): 54-56.

[9] 曹婧.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策略[J].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37(1): 100-103.